

西方国际思想大师译丛

国际思想大师

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Major Twentieth-Century
Theorists and the World Crisis

[美] 肯尼思·W.汤普森/著
Kenneth W. Thompson

耿协峰/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西方国际思想大师译丛

国际思想大师

——20 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

[美] 肯尼思·W. 汤普森 著
耿协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字 01-2003-2112 号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Major Twentieth-Century
Theorists and the World Crisis by Kenneth W. Thompson
Copyright © 1980 b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思想大师:20 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美]汤普森著;耿协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

ISBN 7-301-06333-4

I. 国… II. ①汤… ②耿… III. ①国际关系学-学者-生平事迹-世界-
20 世纪 ②国际关系理论-概论-20 世纪 IV. ①K817=5 ②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4467 号

书 名:国际思想大师——20 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

著作责任者:[美]肯尼思·W. 汤普森 著

耿协峰 译

责任编辑:诸葛蔚东

标准书号:ISBN 7-301-06333-4/D·073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排 版 者:高新特激光照排中心 62637627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9.75 印张 244 千字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译 丛 总 序

国际关系学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基本上是二战后的事,但从1939年卡尔发表《二十年危机》从而奠定国际关系学科基础之时算起也已经有六十余年之久了。在这六十余年时间里,国际关系学在西方成为一门影响广泛的学科,是与一批思想深刻、视野开阔的知识精英分不开的,正是他们奠定了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地位和实践地位。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教授肯尼思·W. 汤普森从这批人物中挑选出了他认为最有影响力的十八位学术领军人物,冠之以“国际思想大师”的荣衔,对他们的生平及思想历程进行了简约而准确的评述,遂有其名著《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的诞生。该著虽然发表于1980年,但至今具有类似于一部简明国际思想“史记”一样的学术价值,为今天学习国际关系、研读国际思想的人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记载。该著在国际关系学术作品中的开创性贡献是,它不以理论流派或理论方法为分界线,而是以学术人物为核心,同时也按照他们思想的大致倾向把他们划分到四个不很严格的问题领域中进行评述。它所划分的四个问题领域是:规范思想、欧美的权力与政治观念、冷战冲突分析和世界秩序理论。该著所写思想人物大多为我国读者所熟悉,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马丁·怀特、汉斯·摩根索、卡尔·多伊奇、沃尔特·李普曼、乔治·凯南、雷蒙·阿隆、昆西·赖特、阿诺德·汤因比等;但也有一些名字对我们还较为陌生,如:约翰·考特尼·默里、小路易斯·哈利·约翰·赫茨、查理·德维舍。由于作者有着丰富的教学和写作经验,又与这些思

想大师中的许多人曾有私人交往,就使得该著极具可读性和可信性,既是国际关系理论初学者的入门书,又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和学生爱不释手的生动读物。

为了追溯上述这些国际思想大师们的思想渊源,汤普森教授还把视野从二战之后的岁月回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从大范围的政治思想史的领域探索当代国际思想的早期智慧,从而诞生了他的《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在这部著作里,汤普森从讨论经典政治哲学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关联性出发,简明扼要地评述了最早从柏拉图一直到19世纪末的总共十六位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着重阐述了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对当代国际理论和国际事务的重要性。在这本著作中,汤普森的意旨似乎在于:早期的经典政治思想理应是现代外交决策者们的思想源泉,借助于早期思想家的洞察,现代决策者们能够认识到,今天的多数问题,无论背景如何改变,其实质内容却持久未变,对经典著作的深入理解能够帮助他们避免外交决策的失误。这种学术史意识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另外,该著对于国际学术界定义国际关系学科的地位和研究领域也有其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不是决定性的。当然,对于是否应当把这些政治理论传统中的思想家们称为“国际思想之父”,正如汤普森在其《国际思想大师》中对“国际思想大师”的选择一样,无疑都带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但是,也正如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所评论的那样,“从战后发展国际关系学的这一代学者起,国际思想之父就一直是起积极作用的最好的老师之一”。因此,从本学科的思想源头来看,19世纪及其以前的政治理论家无疑提供了最好的思想基础。

1996年,汤普森教授又发表《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通俗易懂地描述了美国较早时期的三个国际关系思想流派——芝加哥学派、耶鲁—普林斯顿学派和哈佛学派,重点在于评述这三大学术流派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并评价了每个学派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贡献,其中也包括他在《国际思想大师》

中已经评论过的人物,如尼布尔和凯南等人。另外,作者对于美国学术界中几种有影响的重要观点,尤其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怀疑论的相互关系进行了阐述。该作品深入而不难懂、简明而不落俗套,对于我们了解作为战后国际关系学科“重镇”的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中的理论发展,甚至整个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史都大有帮助。

就在汤普森发表《国际思想大师》近二十年之后的1999年,由两位欧洲的国际关系学者——伊弗·诺伊曼和奥勒·韦弗尔组织了多位学者共同编著了一部《未来国际思想大师》。他们坦言是在承继汤普森教授在《国际思想大师》和《国际思想之父》两部著作中的写作旨趣(导论中明确宣布:“本书继承了汤普森所开创的事业”),希望为正在出现的一批国际关系思想人物立传。该著与汤普森的这两部著作的最大共同点是:都采用收集这些理论家全部著作的方式来对他们进行理论评价。在诺伊曼和韦弗尔等人看来,汤普森所写的十八位国际理论家代表的毕竟是上一代的思想形象,80年代之后,伴随着国际关系学科内部论战或辩论的不断开展,该学科中也不断涌现新的理论和方法,并且新人辈出,特别地,与汤普森写作的时代不同的是,除了那些明显是在承继和发展上一代思想大师的理论传统的新人物,如文森特、沃尔兹等人之外,还崛起了一批以批判或解构以前时代国际思想为旨趣的,并有意无意地在建构新的理论研究路线的新人物,比如沃克、温特、奥鲁夫和德里安等。《未来国际思想大师》的编者虽然讨论了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期间的重要辩论的性质和形势,并且也大体指出了两种相对的思想路线——理性主义流派和反思主义流派,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所要讨论的人物按照这种流派划分法来加以严格归类,而是以人物为中心,在介绍他们各自的思想发展和成就的过程中,让读者去体会国际关系学科中研究路线的动态变化。当然,叙事者是难以规避开他们正在其中进行叙事的语境的,该著的编者也坦率地承认,他们在挑选这

些人物时是有倾向的,突出了“那些从崭新的角度出发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着抨击的人物”,尽管这样的一些人物“至今犹未被承认是这一领域的大师”,因此他们更想通过此书,“从最新的研究思路中推出一些更有力的大师候选人”来。另外,作为积极的叙事者,由于编者和各章的作者本人都是这门学科“之中”的人物,他们除了首先想要为读者解读这门学科,为读者提供一条他们认为是通往国际关系领域的“新颖门径”外,他们还强烈地表现出参与该学科建设的热情,那就是,企图“展示一下该领域里某些顶尖作品的多姿多彩特征,并打破那种将这些作品当作是诸多非人化的‘学派’或‘范式’的组成部分的趋势”。

汤普森的《国际思想大师》一书已经为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广泛熟悉,而诺伊曼和韦弗尔等人的《未来国际思想大师》一书则代表了解读该学科的一种新倾向或新趋势,尚未被我国读者所充分重视。希望我们以这两本著作为核心规划出版的这套小小的译丛,能够为我国越来越多对国际关系理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块真正的“敲门砖”。至于说在译丛名字中冠以“西方”二字,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国际关系学看作是西方的学问,学问本身不应该有这样的分野,区别只在于发展的早晚和先后。今天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已经满怀有所建树的热情,试图在国际关系学流派纷呈的交响乐中融入中国的声音、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流派,因此我们也真诚希望,“国际关系的未来”不仅属于这些在国籍上隶属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家们,也属于我们这个东方文化大国的思想理论家们。当然,缔造出中国的国际思想大师,尚需要艰苦不懈的努力!

最后,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思想译介过来,是为了开拓我们的视野,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与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对此还请读者注意分辨。

前 言

爱默生曾写道：“宁赏一尾大鱼跳，不捉一串小鱼苗。”本书所写的人物，他们无一不有着广博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堪称国际思想界的“大鱼”。笔者按照国际问题研究的四大领域来讨论他们，即：规范思想（normative thought）、欧美的权力与政治观念（European-American concepts of power and politics）、冷战冲突分析（Cold War conflict analysis）和世界秩序理论（world order theory）。笔者分析、探讨了这些思想家们的主要研究方法、教育背景、理论前提和假设、理论概念、价值体系、思想发展阶段、他们对公共政策的贡献以及对未来的远见卓识。此外，笔者还讨论了那些影响了这些人物的其他思想家。在写作本书时，笔者所根据的是这些人物的著述、随笔、其他人对他们作品的批评与辩护、答记者问、回忆录、往来书信以及笔者本人与他们中一些人的个人交往。在论述每位思想家之后，书中还开列了他们各自的主要作品以及对他们进行评论的作品的目录。

笔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与人共享国际关系学界领军人物的智慧与学识。他们的作品在过去三十年间使笔者目睹了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所以笔者挑选他们是有一定理由的，对此，别人可能会争论、批评、甚至摒弃，但就笔者判断，无论我们要理解国际政治还是要建立一个具有活力、条理清晰的思想框架，他们的作品都是至关重要的。有时人们说国际研究著述有点儿赛过高级新闻编辑，也有人说国际研究不过是美化时事。本书所讨论的每一位作者都曾在国际研究领域中对某一个有组织

有系统的思想方法做出过贡献,每一位作者的思维模式都可以应用到对某个长时期内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和事件的分析上。

这些思想家们的作品有着延续不衰的价值,让笔者难以抗拒。挑选并评价他们的作品不能够依照许多出版商和读者所用的营销成功与否的标准。本书所选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曾经上过畅销书排行榜。除了一个例外,他们中也没有人获得过“每月一书”(Book-of-the-Month)奖。虽然他们没有像某些作家那样被人包装而堪称“麦迪逊大街制造”(“made by Madison Avenue”)①,但是,这些思想大师的作品,甚至他们在五十年以前写的一些书,却仍在决策者和学者们中间被广为阅读。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挑选这些人显然既有客观依据也有本人的主观偏好。指出一些看起来客观的重要性标准是完全可能的,但不同的评者对这些标准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客观标准就是这些作者的著作目录。尽管有些目录比别的要长,但每个目录中都有一大串精心挑选的重要作品。记者和学者们引用或引证这些作者,在谈到他们著作的重要性时,其肃然起敬的情形恰如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②在其专栏中向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Sir Herbert Butterfield),或者戴维·布罗德(David Broder)向汉斯·J.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经常表示敬意时一样。另一个客观标准是学者的评论和学术会议上的反复讨论。第三个标准是学位论文、期刊文章,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在《代达罗斯》(Daedalus)③ 1987年春季号上发表的国际研究述评,以及为纪念某个学者而出版的纪念性文集等。写作方家经常可以激起争鸣,也可能开辟新的研究园

① 麦迪逊大街是美国纽约市的一条著名街道,它是美国各大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的集中地,因此人们常用此街名来表示这些公司的业务特色。——译注

② 生于1909年,苏格兰裔美国新闻记者。自1939年以来在《纽约时报》工作,1945年及1957年因其报道而被授予普利策奖。——译注

③ 又译《第德勒斯》,杂志名,取自希腊传说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代达罗斯,他曾为克里特国王建造迷宫。——译注

地,为思想界带来一个又一个“突破”。他们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并且当那些更时尚却更短暂的研究方法风行过去之后,他们仍旧能够备受青睐、历久弥新。

岁月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严格而准确的评估方式。某家期刊可能会不在意一位作家,某一出版商可能会拒绝出版他的作品,某一作家文集也可能会漏登他,甚至某些腐儒会对他的作品横加指责。然而,在文学界和哲学界,尽管岁月迁延,读者仍在阅读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在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阅读霍布斯和洛克。这里所论的思想大师及其作品可能无法与莎士比亚这样的不朽巨匠相提并论,但是很显然他们的作品仍为当代思想界所继续阅读。当《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为了评述过去二十五年到五十年间的重要人物而挑选值得重视的思想家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总是位列国际关系类作家名单的前茅。在那些编制这种思想大师名单的人看来,他们的作品显然具有经久不衰的价值。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要估量这些思想家中某些人的影响力也许还嫌太早,还没法判断他们的作品是否经受得了时间的考验,因为它们差不多都是最近的作品。正规的国际政治研究在学术园地里还是一朵蓓蕾。当然,像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等人,他们的作品将来在学术文献中注定会占据一席重要位置,这绝非凭空妄言。

说到这里,笔者还应该承认,本人挑选这些作家时并不排除主观因素在内。本人不仅了解这些思想家们的作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跟这些人还很熟识。任何学术性的评价都难免掺入个人的偏好因素,因此在这里笔者也不否认个人因素的影响,否则就是自欺欺人。但是,不论他们的贡献有多大、他们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如何,笔者都没有因此而回避针对他们个人和他们学问的批评。在笔者看来,他们虽然大都是学问上的巨人,但他们毕竟

还是人，不是神。如果本人有过誉之处，还请他们宽容；如果本人的批评有所不公，也请他们原谅。他们的学术信誉为笔者树立了榜样，促使笔者谨守诚实与坦率，本人确信，对他们的伟大之处绝无盲目崇拜，更不至于顶礼膜拜、丧失原则。

目 录

第一部分 探求政治的规范基础 (1)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900—1979)

历史大视野 (5)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

由神学到政治审慎 (21)

约翰·考特尼·默里(1904—1967)

基督教与战争 (43)

马丁·怀特(1913—1972)

西方文明的价值 (52)

第二部分 权力与政治 (73)

E. H. 卡尔(1892—)

无处不在的权力标准 (77)

汉斯·J. 摩根索(1904—)

政治现实主义诸原则 (93)

尼古拉斯·J. 斯拜克曼(1893—1943)

地理与权力 (106)

阿诺德·沃尔弗斯(1892—1968)

概念化与寻求共识 (111)

约翰·H. 赫茨(1908—)

调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124)

卡尔·沃尔夫冈·多伊奇(1912—)

政治研究的科学方法 (130)

第三部分 冲突与当前危机 (143)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

理性主义与政治理性 (147)

乔治·F. 凯南(1904—)

挑战法制至上和道德至上主义 (166)

小路易斯·J. 哈利(1910—)

从历史看危机 (183)

雷蒙·阿隆(1905—)

冲突与社会学的想像力 (195)

第四部分 世界秩序理论家 (207)

昆西·赖特(1890—1970)

不同一般的战争研究 (211)

戴维·米特兰尼(1888—1977)

以功能主义超越政治学 (233)

查理·德维舍(1884—1973)

世界秩序与法律现实主义 (249)

阿诺德·J. 汤因比(1889—1975)

世界文明与世界政治 (259)

人名译名对照表 (287)

第一部分

探求政治的规范基础

在探求政治的规范基础的人中，神学家和宗教史学家无疑是走在最前列的。当然，并非任何宗教传统都鼓励人们去关心道德与政治。有些宗教传统视政治为生命的另一种重负，人类必须泯灭对尘世的关心才能免除它。比如佛教人士就追求走向涅槃，进入极乐世界，享受那种一切皆空、无争无欲的境界。但是在大多数西方宗教传统中，仍认为，人生天地间，就注定要经受生命中无休止的道德与政治困境的磨炼。

尽管西方宗教教导人们生为今世，也生为来世，但是，当代宗教思想家中，其著作作为研究道德与外交的学者所一读再读者，仍在少数。原因之一可能是，国际领域错综复杂，要深入其中必须精通对外事务，而这只有为数不多的伦理学家才做得到。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宗教学家们纷纷想做社会改革的先驱者，热衷于从事十字军东征一样的社会政治运动，他们认为那才有意义，哪怕总是瞬如流星。宗教思想家们对政治的关心，常常表现为逃避，他们关心的是恒久真理的崇高的精神依据，或者干脆就加入到那奔涌的社会改造洪流中去，而把那种是非难分、善恶难辨的严酷的政治任务留给了世俗领导者。

幸运的是，大凡从事政治伦理研究的观察者都能够指出，在这几种宗教传统中尚有一些人物是例外。那些非宗教的政治作家以及政治科学家一谈起宗教作家来，就认为他们不过是布道

士。这种断言给信教者和作此断言的人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冲破宗教正统学说的桎梏之后,现代非宗教思想家们竟然又企图自欺欺人,对宗教思想所做的贡献熟视无睹。对于一个开放的、有理性的社会而言,吸收那些由主要宗教传统中大师级的学者所贡献的真知灼见,应当如欣赏最优秀的世俗思想中的聪明才智一样,都是义不容辞的。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教条主义,都会践踏思想自由。追求健全政治伦理的人们必须追随真理,不论真理引领人们去向何方。

在国际伦理学方面著书立说的宗教史学家中,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卓而不凡。在发表其《辉格党人的历史观》(*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一书之后,巴特菲尔德就奠定了他本人在英国传统历史著述中的不朽地位。在那之后不久,他转向宗教史学,写出了《基督教与历史》(*Christianity and History*)、《欧洲历史上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European History*)和《基督教、外交与战争》(*Christianity, Diplomacy, and War*)等著作。此外,巴特菲尔德还通过由他创建于剑桥大学的“国际政治理论英国委员会”(the 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工作而将其学术影响扩大到政治伦理学之中。尤其突出的是,巴特菲尔德及其伙伴们在理解冷战的伦理方面、在讨论像“均势”这样的经典概念上,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照乔治·F. 凯南(George F. Kennan)的话讲乃是“众家之父”(the father of all of us),曾就当代国际政治著书立说。这位卓越的神学家对近来的知识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任我们怎样形容都不为夸大。沃尔特·李普曼在评价尼布尔的贡献时问道:“要经过多少世代我们才会再见到一位像他这样出色的人呢?”在其海量的专著和论文中,尼布尔所发掘的是他所谓“基督教现实主义”在应用于国际政治时的主要基本原则。他的著述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曾一度被基督教徒和社会活动家们所忽视,但在70年代末期又被重新发现。任何人在探

求条理清晰、一以贯之的政治伦理研究方法时,都无法绕开他的作品。

在近来关注伦理与现代战争的罗马天主教作家中,约翰·考特尼·默里牧师(the Reverend John Courtney Murray)超群出众。尽管默里把他的国际伦理学作品归入到研究道义与政府的更宽广思路之中,但他仍值得我们关注,而且仅靠本书对其思想的简明介绍还远远不够。在研究道义与外交的学者中,惟有默里将其思想建立在古时受尊崇的罗马天主教自然法传统中,对这种传统笔者毫无造诣,无法据之对他做出完全公道的评论。

我们有必要转到一位英国学者身上来结束对宗教思想家们的回顾。马丁·怀特(Martin White)英年早逝,所遗作品无多,但是他的影响却因有大批受其鼓舞的后学而长存于世。他既是一位历史学家,又是一位国际政治学家,他在学术上的著述虽稍逊于巴特菲尔德或尼布尔,但仍有着不朽的价值。他的一些作品是在他身后经由其同事和学生的忠实努力而得以出版的。他比任何现代作家都更加致力于在伦理学基础上重建当代思想,使之继续沿着西方文明传统演进,而遵奉西方文明传统,是他至死不渝的信念。

在一部介绍这些宗教思想家们著述的书中,不可能全面概括他们思想的异同。作为历史学家的巴特菲尔德始终坚守历史学学术的牢固阵地与根本原则,从未曾涉险远离。从尼布尔和默里的著述看,他们自始至终都主要是神学家,虽然他们更关心当代紧迫性社会政治问题,而并非经院式的神学家(尤其是尼布尔)。至于怀特,他所关心的焦点时而为欧洲史时而为当代史,反映了他对古典思想和现时国际政治的一贯兴趣。

尼布尔和默里两个人经常就自然法的实用性及其应用于核时代的问题争论不休。所有这四位思想大师都认识到了当代国家间关系的非理性,但是默里比其他几位更加认为,传统的自然法可以为国家间关系提供行动的持久准则。他们四位没有人质

疑宗教对国际政治的终极意义,尽管他们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方式来界定这种意义。

显然,对这些大师和其他大师思想的介绍无法取代对他们的作品文本的细致披阅。本人仅仅是想向大家介绍这一类思想家——介绍他们的著述、他们关于人和政治的基本假定、他们关于国际体系性质的界定、他们对国际政治规范结构以及对权力的作用及限度的观点。